

十五年戰爭期的中國文學



著者 樹直口阪
譯者 宋宜靜

十五年戰爭期的中國文學

阪口直樹 著
宋宜靜 譯

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十五年戰爭期的中國文學/阪口直樹著；

宋宜靜譯——初版——臺北縣板橋市：稻鄉，
民 90

面；21 公分

ISBN：957-9628-74-2（平裝）

1. 中國文學 — 民國 26-34 年（1937-1945）

—評論

829.8

89020236

十五年戰爭期的中國文學

作 者：阪口直樹（さかぐち なおき）

譯 者：宋宜靜

發行人：吳秀美

出 版：稻鄉出版社

臺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吉豐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32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90 年 2 月

I S B N：957-9628-74-2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台灣版 序

約自距今三十年前，我開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這個題目，而在當時極為猖獗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之下，我主要的研究目標是意圖脫離共產黨的革命史觀或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框架，也就是致力於追求文學的歷史相對化。我的工作重新建構現代文學史中被否定的事象，在中國國民黨被烙印為「惡」的化身，以及研究台灣被視為不正常的狀況下（我本身也曾為其所束縛），此項目標仍能徐徐獲得進展。現在，日本學界已不復見此種束縛研究禁區的陰影。

本書於一九九六年在日本出版時頗獲好評，筆者甚至被邀請在一九九八年五月武漢舉行的國際學會中報告有關國民黨的研究，此點多少顯現時代變動的趨勢。特別是此次拙著的台灣版得以誕生，其所象徵的意義更讓人深有所感。雖然我個人對於能在台灣出版深表興奮，但對於同時須面對台灣讀者嚴厲的目光一事，亦令我不禁深感惶恐。雖然預感到在研究上的真正議論可能剛要展開，但我仍衷心期待本書的刊行，能成為增進今後日本與台灣對等學術交流的契機。

最後，在此向提供本書完成上不可或缺的各種資料和協助研究的黃英哲氏，以及其他許多台灣友人致上最深的謝忱，並對譯者宋宜靜小姐的辛勞表示稱許。就此擱筆。

二〇〇〇年正月於日本奈良

日本同志社大學教授

阪口直樹

目次

台灣版 序.....	I
目次.....	I
序章 十五年戰爭期中國文學與國民黨.....	1
第一章 三〇年代初期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	13
第二章 《子夜》中「買辦」的意義.....	43
第三章 論〈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61
第四章 茅盾及〈文藝工作者宣言〉.....	93
第五章 《文學》與茅盾——關於「國防文學論爭」.....	113
第六章 徐懋庸在「國防文學論爭」初期之定位.....	145
第七章 武漢「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之展開.....	167
第八章 《腐蝕》的背景——茅盾與國民黨「特務組織」..	195
第九章 重慶時期的國民黨文化政策及劉百閔的出版活動..	231
第十章 「戰國派」的文學與文化論.....	263
終章 國民黨文化政策之推展與胡適.....	293
跋	309

序章

十五年戰爭期中國文學與國民黨

一、「左聯」時期文學研究的問題

一九六六年所展開為期十年的「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凸顯許多負面的文學事象，其後迫使我們重新檢討歷來的研究態度和方法，但筆者真正明白問題意識的所在，則是以一九八一年寫成〈「文學史觀」與「文學事實」的峽谷間——對新版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考察〉（《「文學史觀」と「文學的事實」はざま——新版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を考察する》）¹一文為契機。該文是執筆合著《野草》特集〈《中國現代文學史》諸本の検討〉時，以三〇年代為焦點，指出各種文學史常以其特定的史觀，而對文學事實做出

¹ 《野草》，第27號，1981年4月。

2 十五年戰爭期的中國文學

不正確敘述的問題。其後，因田仲濟於〈修訂再版後記〉²中對筆者的批判，及筆者以〈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修訂版——並答〈再版後記〉〉〈《中國現代文學史》（田・孫本）修訂版について——あわせて「再版後記」に答える〉³加以反駁，而繼續此一問題的論爭。在此過程中，筆者針對「國防文學論爭」的文學事實，寫出幾篇文章闡明「國防文學」派並非僅以周揚一人的立場為代表性，而是經徐懋庸、周立波甚至傅東華、茅盾等許多作家的相互變化與影響而成；⁴以及呈現茅盾在「國防文學論爭」中，基於當時社會對《文學》雜誌的壓力和其與魯迅的複雜關係，使他的態度由早期的旁觀者立場，轉為「國防文學」派，再轉為「調停派」。⁵這些事實證明一般對「左聯」的固定價值觀須有所修正。亦即，不能由魯迅=善，周揚=惡；或「國防文學」派對「民族主義戰爭的大眾文學」派的固定模式來掌握，而須導入重視作家間相互「關聯性」的視點。同時，此觀點不單適用於作家之間，在處於「左翼文學・都市文學・民族主義文學三派鼎立」⁶狀況下的三〇年代文學中，亦可能擴大適用於幾個文學流派之間。特別是在左翼文學被迫與國民黨系文化潮流競爭和對立的狀況下，若不導入重視兩者間「關聯性」的視點，即無法明確表現文學狀況的實像。

² 田仲濟・孫昌熙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修訂本）》，山東文藝出版社，1985年5月。

³ 《野草》第38號，1986年9月。

⁴ 參本書第六章〈徐懋庸在國防文學論爭初期之定位〉。

⁵ 參本書第四章〈茅盾及〈文藝工作者宣言〉〉、第五章〈《文學》與茅盾——關於《國防文學論爭》〉。

⁶ 〈一九三〇年代概說〉，《原典で読む圖說中國20世紀文學》，白帝社，1995年3月。

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基本上均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文學史觀。例如，其中甚至有將「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所負擔的任務，定義為：「作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由於現代中國的性質規定了中國的革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文學，因此，歷史賦予新民主主義文學的根本任務就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⁷

無庸贅言地，此觀點在歷史的特定階段中曾發生過很大的作用。然而，它在九〇年代是否能繼續發揮力量則很難論斷。由於它深深刻烙著抗戰時期的歷史腳印，因此常導致「只看到中國落後的一面，而抹煞中國近代化產物」的結果。

執政長達幾十年的國民黨，除了軍事、政治以外，在文化方面亦處於重要的地位，從而影響著學術、文學、出版社等文化機構。然而，或許是國民黨曾和共產黨進行敵對戰爭的緣故，中國國內迄今尚無針對國民黨系文化潮流的研究。尤其三〇年代到四〇年代，所有課題都圍繞著中國民族的「生存」或「滅亡」而展開，而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兩黨在所有戰線上均展開「對立・合作」的微妙鬥爭。因此，我們如要恢復現代中國歷史的真貌，即須以兩黨「相互對應」的觀點來分析文化現象。

二、國民黨系文化潮流的再評價

在三〇年代與「左聯」敵對的國民黨系文化潮流，以往學界均稱其因受到「左聯」的痛擊，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國民黨挖空心

⁷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

思搞起『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便宣告徹底破產了」。⁸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新村徹（日本學者）在七〇年代即已指出：「此鬥爭在三〇年代的任何時點均未曾停止過，甚至在『左聯』解散後仍長期持續進行著」。⁹即便是在八〇年代的中國，也有蔣洛平表示：「從三〇年代到四〇年代，『民族文學』鬧過三次，一次是在左聯成立，使左翼文藝運動獲得重大發展的一九三〇年；一次在文藝界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蓬勃開展的一九三七年初；再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前後的反共高潮中，……把這看做民族文學發展……曲線上的三個波峰，比把這看做彼此無關的三個孤立的文藝現象，可能更接近真實」。¹⁰此種說法駁斥左聯所宣稱的「早期絕滅說」，指出國民黨系的「民族文學」流派乃是整個抗戰時期一脈相承的。但以上討論均停留在總括性提要的層次，而未曾深入作個別的研究。因為政治因素造成資料嚴重缺乏自然是直接原因，但筆者在此想從「方法論」的觀點提出若干問題。

首先，《前鋒周報》是上海「民族文學運動」的根據地，創刊於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二日，而於次年五月三十一日停刊。當時，「左聯」戰線上的茅盾、瞿秋白、魯迅等作家均曾對這份雜誌大加撻伐。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左聯」《文學導報》上攻擊《前鋒周報》的時間是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到十一月十五日，其時《前鋒周報》、《前鋒月刊》早已停刊。正如辛島驍（日本學者）曾提及的，這項矛盾必

⁸ 《中國現代文學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

⁹ 新村徹〈「民族主義文學」と左連〉，《野草》第14・15合併號，1974年4月。

¹⁰ 〈關於「民族文學」——一個備忘的提綱〉，《重慶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4期。

須慮及國民黨內部「宣傳部」與「組織部」的派系因素，以及切入「九一八事變前在上海與南京兩處中國文壇」¹¹的文學地理觀點，方有可能加以理解。

舉例而言，在《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發刊之後，除了黃震遐〈大上海的毀滅〉在上海廣獲好評而繼續連載外，其餘「組織部」系統的重要據點均移往杭州，改以《黃鐘》（黃鐘文藝社，一九三二年十月～一九三七年五月）或《民族文藝論文集》（杭州正中書局，一九三四）等繼續從事文化活動。

另一方面，「宣傳部」系統則展開更大規模且長期的活動。「宣傳部」系統的據點在南京，以王平陵為中心組成「中國文藝社」，發行《文藝月刊》（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長達十年之久。¹²在王平陵等的影響下，胡紹軒或魏紹徵等人稍後在武漢成立「武漢文藝社」，出版武漢《文藝月刊》（一九三五年三月～一九四八年三月），並組織「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為抗戰時期統合國民黨各派系作家的核心組織。¹³

然而，國民黨自己的文化政策卻是在稍後才擬定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確定文化政策案〉，其中包括「獎勵學術出版」、「強化檢閱制度」等文化出版政策，其內容稍後更隨著抗戰的激化而更為具體化。

在此時期，國民黨在農村組織「文化中心根據地」、「文化響應站」，展開大字報、小報（油印）、小冊子等普及活動，在城市則運

¹¹ 辛島驍《中國現代文學の研究》，汲古書院，昭和58年10月。

¹² 參本書第一章〈三十年代初期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

¹³ 參本書第七章〈武漢《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之展開〉。

用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中國文化服務社等直轄出版社的出版活動，或由「文運會」（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舉辦名人演講會、戲曲表演等文化活動，或藉由經濟援助以拉攏左翼作家。正如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藩以〈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對抗毛澤東的〈文藝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一般，兩黨在國共合作期間仍於文化戰線上一直接續著激烈的對立與競爭。¹⁴

的確，若綜觀上海、杭州、南京、武漢、重慶、昆明等地的文化狀況，就能理解三〇年代到四〇年代中國文學的獨特性。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改變以往「三〇年代文學」、「抗戰時期文學」的斷代分期，而以面對日本擴大侵略的民族課題為標準，將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作為一個段落（例如〈十五年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如此方能理解此時期的文學特徵。

三、對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民族主義

當權的國民黨在其官僚機構內吸納大量有留學經驗的知識份子（特別是留美學生）。以清華學校（其後的清華大學）為主的學校，自清末開始即送出大量的留學生赴美，其總人數在一九二九年時已達一千九百人。¹⁵他們歸國後從事的工作集中在教員、技術專家及實業家三方面，其中大學教授、教育界的比例約佔 34.4%。¹⁶這些人將留學時獲得的近代技術與思想，活用於國民黨政府的官僚機構中，這意味著他們

¹⁴ 參本書第九章〈重慶時期的國民黨文化政策及劉百閔的出版活動〉。

¹⁵ 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財團法人日華學會，昭和 14 年 3 月。

¹⁶ 阿部洋，〈義和團賠償金によるアメリカの對華文化事業〉，《米中教育交流の軌跡——國際文化協力の歴史的教訓》，霞山會，昭和 60 年 12 月。

處在策劃國民黨文化政策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專攻人文科學的中國留美學生中，少見國際主義者而多傾向於民族主義。此點由一九二五年七月由留美學生組成的「大江會」（成員包括梁實秋、聞一多、羅隆基、吳景超等二十九人）或同年成立的「神州會」（成員有邱椿、劉師舜等）等，均屬「國家主義」團體即可見一斑。¹⁷甚至如吳宓、梅光迪、胡元驊等因留美期間受到巴比特（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義」影響的「學衡派」，他們雖被批評為「鼓吹封建復古主義，反對新文化運動」，但其性質亦是屬於民族主義潮流的團體。¹⁸由此可知，隨著抗日戰爭的激烈化，這批留美人士藉著強化民族主義思潮而左右輿論的動向。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下簡稱〈文化建設宣言〉），主張在國家當前的危機下，要從「保守・折衷」的角度，創造中國獨特的文化。這十位中有四位（何炳松、章益、孫寒冰、黃文山）是留美人士，而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松（商務印書館及暨南大學的重要人物），他在擬就此宣言時即引用美國學者羅賓森（James Harvay Robinson）的文化史方法。侯健即將這份〈宣言〉和一九二三年的「科學與玄學」論爭、一九二五年《甲寅》雜誌的復刊，並稱為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三次」攻擊。¹⁹

¹⁷ 楠原俊代，〈アメリカ留學生の肖像——大江會同人をめぐる（續）〉，《同志社法學》第200號I，1987年。

¹⁸ 孫尚揚〈在啓蒙與學術之間——重估〈學衡〉（代序）〉（《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1995年12月）中認為，〈學衡派〉的傳統主義乃是追求傳統文化中普遍、永久性的人文價值，與國粹派有別。

¹⁹ 參本書第三章〈論〈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參照侯健，〈梅光迪、

在其後的四〇年代初期，昆明出現「宣揚國民黨特務政治，傳播法西斯思想的文藝潮流」。²⁰這個被稱為「戰國派」的文藝團體，其主要成員是雷海宗、陳銓、林同濟等人，他們以「英雄崇拜論」為哲學、「文化形態論」為史觀，創作「特務文學」和「民族文學」，推動當時國統區的文化運動。其中，雷海宗更曾以德國歷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在《西洋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中的手法，為中國描繪較西歐更高層次的大一統帝國藍圖。²¹這個「剛性的尚力文化思潮」並非「法西斯」反動思潮，而是「有著某種共同思想旨趣文化體系的學術沙龍、文化圈……亦不過是在「抗戰」這個特定歷史時期下的一脈文化民族主義的支流」。²²如此可見，抗戰時期表面上相逆反的兩股文化潮流，其實可視為共同匯流於自二〇年代、三〇年代以來始終一脈相承的所謂「文化民族主義」潮流中。

四、結語

以國民黨系文化潮流的觀點分析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若干問題，並不是意圖拯救國民黨的文化地位，而是為了打破歷來所謂「左聯中心主義」的成見，以謀求歷史的「相對化」。仿照竹內好（日本學者）「做為方法的亞洲」、溝口雄三（日本學者）「做為方法的中國」的論點，我們或許亦可將此稱為「做為方法的國民黨」的觀點。

自一九三五年初，刊載〈文化建設宣言〉的《文化建設》雜誌，

吳宓與學衡派的思想與主張》《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外文學月刊社，1974年12月，頁84。

²⁰ 唐弢·嚴家炎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12月。

²¹ 參照本書第一章〈「戰國派」的文學與文化論〉。

便容許托洛斯基主義等非國民黨論調的存在，顯示國民黨的文化組織有著出乎意料之外的寬容力。「左聯」於翌年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但這並非出於「左聯」的「主動・積極」，而是迫於國民黨拉攏大量知識份子的情勢下，使「左聯」不得不「被動的」改變訴求。如此，從國民黨系文化潮流的觀點切入，方能將「左聯」的「積極性」這個既有概念²³加以相對化、客觀化。

同時，在評析茅盾的《子夜》、《腐蝕》兩部作品時，「作為方法的國民黨」這個概念才更能發揮作用。以往學界一致贊揚《子夜》所刻畫中國三〇年代初期的真實面貌，而稱其為中國寫實文學的頂尖之作。然而，依據最近對國民政府時期的研究指出，學界已承認南京國民政府在三〇年代確曾實施：①關稅自主、②整備金融體制、③以發行公債蓄積國家資本、④統一貨幣等一連串的經濟改革，顯示國民政府有意脫離對外國資本（及與其直接結合的買辦）的依賴。如此看來，《子夜》作品裡的買辦資本家形象便失去其現實根據。²⁴

至於另一部作品《腐蝕》，一般認為其中藉由對「女特務」趙惠明不尋常的心理描寫，揭露國民黨特務組織的罪孽。但是，當時國民黨的特務組織有「中統」和「軍統」兩個派系，且二者經常處於相互對立與競爭之中。茅盾曾經與「中統」維持相當良好的關係，積極參加「文運會」的活動，並得到他們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茅盾對於「軍統」則始終抱持著排斥的態度，並將現實存在的「軍統」女性（趙惠明的原形）寫入作品當中。當此種「國民黨＝一體的＝壞」的單純

²² 唐文權，《覺醒與迷誤》，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²³ 參照註18。

²⁴ 參照本書第二章〈茅盾《子夜》中「買辦」的意義〉。

構圖崩潰之後，我們便不能不大幅調整先前對《腐蝕》或茅盾的評價。²⁵

從思想潮流的角度來看，國民黨雖處於保守、傳統、復古文化思潮的立場，但仍擁有一批受現代思潮影響的知識份子。他們身為政府官員，負有確立國民國家體制之責任，當然會傾向於「民族主義」。這一潮流以往均以「復古、反動」而被全面否定為「文化保守主義」。艾愷（Guy Alitto）闡明此潮流常被視為「傳統的」、「保守主義」的原因，而重新將其定位為「文化守成主義」。至於其源流則要追溯到辜鴻銘、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等學者或「學衡派」、「甲寅派」等文學流派的動向之中。²⁶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近百年的近代化過程中，其主要課題一直是近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建設，所以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到國立西南聯大的聞一多、雷海宗，很多學者都存在著對民族與國家的嚮往。可是，歷史不曾給這個「文化守成主義」原本應有的定位，反而以「復古·反動」為口實，將他們拉下歷史的舞台。此點正顯示我們須擺脫「五四史觀」而重新評價國民黨系文化潮流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中國在八〇年代提起李澤厚「救亡與啓蒙的二重變奏」或汪暉「三種文化記憶方式」（文化批判或啓蒙主義方式、民族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新民主主義或共產主義方式）²⁷的熱潮，其結果僅是以①傳統←

²⁵ 參照本書第八章〈《腐蝕》的背景——茅盾與國民黨「特務組織」〉。

²⁶ 艾愷，《文化守成主義論——反現代化思潮的剖析》，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1月。此外，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第1卷1800-1949）》（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5月）一書中，亦列有〈文化保守主義的崛起〉一項，簡述其發生的原因與興起的經過。

²⁷ 參照拙譯〈民族主義的・文化保守主義的記憶方式からみた「五四・新文

→反傳統②救亡←→啓蒙兩個座標軸進行分析，但現在似有必要再加上③近代←→反近代（反進步史觀）的新座標軸，以求許實顯現當時中國的文化實態。

化運動」觀》，《野草》第 50 號，1992 年 8 月。

